

陆咸 著

窗棂纪事

 文匯出版社

窗棂纪事

陆咸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窗棂纪事 / 陆咸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496-2304-4

I. ①窗… II. ①陆…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934 号

窗棂纪事

著 者 / 陆 咸
责任编辑 / 许 峰
装帧设计 / 周 丹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市大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6.375
字 数 / 110千

ISBN 978-7-5496-2304-4
定 价 / 30.00元

前言

这部文集结集的是我多年来所写散文中的一部分。它是我生命轨迹中的一些片断，虽然只是零零碎碎的记事，却也曾深深地感动我，使我至今不能忘怀。

我的一生中，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颠沛流离，解放战争时期的迷茫和觉醒，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欢乐与兴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艰难曲折，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崛起。在这期间，我遇到了许多难忘的人和事，把这些记录下来，是个人情感的需要，也为这个大时代保留一些鲜活的素材。

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不仅扫清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屈辱，也大大地扫除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对我们思想上的禁锢。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终于崛起；但一切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兴奋和喜悦，也有痛苦、迷茫。把社会主义建设比作一场新的长征，是不错的。我们的后代仰望这个时代，就会如同我们仰望伟大的长征一样。我有幸作为一个小兵，参加了这次新的长征，把我经历过的这些事记录下来，虽然只是星星点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能记录下来的经历有限，不仅因为我没有穿透历史迷雾的笔力，还因为我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苏州。这也局限了我的眼光，我的这些散文，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从中只能看到我生命的一些片断。因此，这本小书的书名，借用了其中一篇文章的名字，

定名为《窗棂纪事》。

我现在已经是站在人生的边上，脑中所想的，总是回忆多于展望。在回忆中我受到感动的，多数是平凡的小事，和我们这个大时代相比，我所记的人和事，都说不上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件，它们只是这个大时代的影子。我想：我们这个时代，是由大事和小事交织而成的，大事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影响了千千万万件小事，大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读者能从这些小事中感受一些时代的脉搏，对我来说，就是万幸的了。

正是本着这种想法，使我有勇气把这些散文结集出版。

最后要说明一下：我曾应苏州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写了两篇家史，只是为研究苏州的历史提供一些资料，现在附在本书最后。

目录

前言

母亲的照片	001
回忆圣陶先生	009
我的大姐	017
祖宅散记	022
泰州情	029
演剧琐忆	035
有原旧事	040
公园遐想	044
公园南池的怀念	047
唐崇侃《铸剑者之歌》序	052
回忆大地图书馆	056
六十年前在苏州	062
春天的歌	069
西山煤矿下井记	075
“开了东坝闸，淹没北寺塔”	079
窗棂纪事	084
丝织英雄汪荣生	089

盛夏季节的怀念	097
他始终关心市县经济的协调发展	104
怀念陆文夫	109
宝岛游子的柔情侠骨	117
初识同里	121
外公的话	124
《二泉映月》和阿炳其人	128
旅美日记摘抄	138
美国风情录	159
天鹅湖之恋	168
尼亚加拉大瀑布	172
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	175
 附录	
陆家两状元	183
陆氏三代儒医	193

母亲的照片

在我保存得最久的那本照相簿里，第一页上是我母亲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她在 1938 年照的，也是她最后的照片。那年她是三十六岁，还只是个中年妇女，但照片上的母亲，疲惫、憔悴、衰老，像是五十多岁的老妇人了。许多人看到这张照片，都以为是五十岁以后照的，其实，母亲在三十八岁时就去世了，她甚至没有活到四十岁。——现在，每当我看到一些年近半百的妇女仍然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时，便会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她衰老的容貌，我的心就感到一阵悲哀。

母亲有她的容光焕发的青春时期。我在大哥处见到母亲二十一岁时的照片，她抱着只有一岁的大哥，坐在椅子上。大概由于初次拍照，她的表情有些紧张。但她的体态是丰满的，也有初为人母的幸福感。——但在我的记忆中，却没有这样的印象。我记忆中的她，一直是瘦弱、疲惫，整天忙碌着，几乎很少有笑容。

父亲在北京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山西工作。母亲和父亲在山西结婚以后，一共生育了七个子女，几乎是每隔两年就要生育一个。我是第五个，上面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多子女是当时中国家庭的常态，那时并没有托儿所、幼儿园之类的机构，一切都由母亲亲自照料着。虽然请了保姆，但



二十一岁的母亲抱着一岁的大哥

母亲总要亲自关心。对于子女，她对谁都没有偏爱，把爱给了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尤其是在我们有病痛的时候。记得我在六岁时，生了牙龈炎，满口腐肉，臭不可闻，谁都不愿意接近我，连服侍我的小大姐也是如此。只有母亲，带我去看病，为我漱口，为我敷药，喂我吃饭，使我在痛苦中感到温暖。母亲也是聪明能干的，她不仅能做各种家务活，还能刺绣、珠算，写得一手娟秀的小楷，所以，对我们的功课，也总是她来辅导和督促。然而即使她这样的辛苦，把她生命的全部都用在对于子女的哺育上，仍发生了不幸的事：在我五岁的时候，全家随父亲调到了山东即墨，我不到三岁的妹妹月月，因为受不住风寒而病逝了。这对我母亲，是第一个打击。

对母亲健康更大的打击，是在抗日战争中。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继7月7日



卢沟桥事变以后，又在8月13日制造了上海事变，向沪宁一带发动进攻。当时我家住在松江，离上海很近，战火随时都会蔓延到这里。父亲因工作调动刚到淮阴，大哥因为是祖父长孙，从小就和祖父母一起住在苏州，松江家里就是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最大的大姐只有十二岁，二哥是十一岁，二姐是九岁，我是七岁，最小的妹妹巧巧不满三岁。如何在战火中保护好这一群稚嫩的孩子，就成为母亲肩上一副沉重的担子。

到9月初，战火已经逼近，我们非得离开松江不可了。回苏州的交通已经中断，我们只能转到嘉兴，走苏嘉铁路转回苏州。铁路秩序非常混乱，人们都向车上乱挤，连车顶上都挤满了人。母亲带着我们这些孩子，还有一些行李，挤上车真是非常困难。母亲抱着小妹妹，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大姐照顾我们几个，好不容易挤上了车，铁路桥又被炸断了，只好又从车上下来，步行过桥，再上火车。差不多一天多时间，才回到苏州老家。

日本飞机不断地对苏州空袭。当时的苏州，既没有防空设施，也没有反击敌机的力量。只能听任敌机如入无人之境，疯狂地扫射和轰炸。警报声、飞机的轰鸣声，机枪子弹的扫射，炸弹爆炸引起的震动，使人们惊慌、紧张。日本飞行员骄狂已极，飞机飞得很低，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我们回到苏州老家后，母亲要照顾我们这一群孩子的生活，又要关心我们的安全。她叫我们在日本飞机来轰炸时，躲藏在床底下或桌子底下，以防敌机的机枪扫射。有一天，日本飞机来轰炸，在我室外不到百米的地方丢了炸弹。我躲在卧室的床底下，突然一声巨响，房子震动摇晃，屋顶砖瓦纷纷落地，房间里顷刻成了瓦砾场。我哭喊着：“我不要死啊！”这时，母亲从室外抢步进来，把我抱了出去。那时



母亲 1938 年的照片，时年三十六岁

的炸弹威力还比较小，如果有今天炸弹威力的一半，我也就必死无疑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虽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但是日寇还是在一步步逼近苏州。到 11 月下旬，我们不得不逃出这座危城了。一天傍晚，我们举家逃离苏州。祖父母、姑母和大哥乘一条船，母亲和我们弟兄姐妹五人乘一条船，是那种摇橹的小船。船舱狭小，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天气阴沉，不见月光也不见星星，在昏暗中一点人的声音都没有，只有摇橹的橹声和船在水上行走时激起的水的哗哗声。四周有不少像我们这样逃难的小船，也和我们的船一样，在沉寂中加速前进。我心中充满恐惧，望着抱着小妹妹巧巧的母亲，不知道我们究竟要到哪里，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突然，隔壁船上起了低低的哭声，祖父突患中风，在船上猝然逝世。祖母匆匆料理了丧事后，在一个晚上，她带了姑母、大哥，



把她们的船开走了，离开我们不知去向。第二天早上我们才知道。

我一直不能忘记那天母亲的表情：惊惶、焦急、无奈。在战火中从松江逃难到苏州，母亲没有能带多少东西出来；战争中汇兑不通，好几个月没有收到父亲寄出来的工资，她身上已没有多少钱了。继续逃难已不可能，我们再乘船的钱已经没有了，只能就地留下来。这地方，就是宜兴西乡的薛家渎。

这是一个江南小村，四周环绕着小河，地点比较偏僻，暂时可以避免战火的侵袭。在这里，我们听不到震耳欲聋的炸弹声，但另一种恐怖又笼罩在心头：人生地疏，无亲无故，母亲身边没有钱又没有粮。带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年幼的孩子，她已经心力交瘁。到薛家渎没有几天，我第二个妹妹巧巧因为受不了风寒，也因为营养不良，得病夭折。母亲又受到一次打击，她几乎要支持不住了，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到附近一座观音庙去烧香，祈求保佑，能度过这艰难的岁月。

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母亲后来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逃在外边，吃的苦是说不完。拖男带女，沿门逐户地乞讨为生。”对我们最大帮助的是当地的村民，这些纯朴的农民，对我们这些逃难出来的城里人充满了同情，拿出他们有限的粮食救济我们。母亲是有强烈的自尊心的，她总是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村民做一些事，来换取一些食物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她帮助村民缝补衣服、记账、写信、读信。她对我们这些孩子很严格，教育我们对人要有礼貌。即使穿的是破旧衣服也要缝补整齐，不许衣衫褴褛。就这样，她获得了村民的同情，也获得了村民的尊敬，有的请她做针线活，有的请她算账、写信、读信。村里人大部分是文盲，尤其是妇女，更是没有识字的，她们对母亲就特别亲近。遇到一些



比较细致的针线活就请母亲来做，要算账更是找到母亲。阴历新年一天一天临近，农民要算账的逐日增多。他们来找母亲帮忙算账，对母亲算的账非常信任；他们也带来一些生活必需品，帮我们解决了生活的需要。就这样，母亲和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母亲在给父亲写的信中，提到这一时期的生活，满怀感激地说：“岂知天有眼，遇着乡下人照应数月。”

隆冬以后，天气渐暖，村民开始了春耕。但外面传来的总不是什么好消息。日本人占领了无锡、常州、南京，到处在杀人放火，回家根本不可能。我们逃难出来只有身上穿的棉衣，连夹衣也没有。虽然经过母亲的努力，几个月来糊了口，但母亲的身体本来瘦弱，几个月的操劳，更是气虚血亏。父亲怎样了？苏州的家怎样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都不知道。

当地农民除了种田以外，就是摇船跑运输，主要是往上海一带来回。由于战争，这个冬季没有人敢摇船外出，他们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后，战线西移，几个经常撑船外出的农民就准备出去冒冒险，到上海去跑一趟运输。母亲写了一封信，托他们带给上海租界里的伯父，信中叙述了这次逃难经过和目前的困苦情况，希望他能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件并无多大把握的事。这几个农民外出本身就有冒险的性质，他们能否到了上海，能否找到伯父的家，伯父如何伸出援助之手，都是毫无把握的事。

这几个村民回来了，带回来伯父的信和二十块银元。伯父欢迎我们到上海去，十块银元是给送信的几位村民的，作为他们送我们到上海的酬金，还有十块银元是给母亲做路费和日用所需。这当然是极大的喜讯，母亲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们几个孩



生。路上遇到三次日本兵盘查，看见是几个孩子和一些简单的行李，也就放行了。然而，在这一路上许多地方是刚刚结束战斗的战场，被毁坏的房屋东倒西歪，一些中国士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却不见有日本兵的尸体。使我感到触目惊心，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心中默默祈祷：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到了上海租界，住在伯父家。母亲拍了一张照片，就是我现在保存的这一张。正是在这张照片上，深深地刻下了母亲的辛苦、焦虑，以及她与艰难困苦顽强搏斗的烙印。

不久，父亲到上海来接我们到苏北淮阴，当时，那里还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1939年日寇进攻淮阴，沿着运河向南轰炸，我们从淮阴逃到兴化，又逃到泰州，我们再经历了一次逃难。虽然由于和父亲在一起，母亲的担子要轻一些，但一路上拖男带女，仍然十分辛苦、劳累。到了泰州，生活刚安定一些，她就得了重病，并且一病不起。1940年11月23日（农历十月二十四），母亲病逝于泰州。从离开上海到逝世，只经过了两年，在这两年中，她没有拍过别的照，上海拍的这一张照片就成了她最后的遗照。

母亲姓胡名璧，字孟华，江西九江人，生于1902年6月23日（农历五月十日），只活到三十八岁。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在逃难最艰苦的日子里，当她独立地承担保护幼小的子女的责任的时候，表现了她的艰苦卓绝和自尊自强的精神。她活得太累，死得太早，没有能看到她子女的成长。但她在子女身上留下的烙印，对我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他人不可比拟的深刻的影响。

现在，我看着她这张照片，想：岁月易逝，母亲的子女也都进入老年，子女的子也大都长大成人，但我们对母亲的怀念，却随着岁月的推移越来越深、越来越厚。

回忆圣陶先生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流离辗转的逃难生活，使我难以按部就班地接受学校教育。我却喜欢看书，曾热衷于武侠小说，也一知半解地看了一些言情小说。最终打开我心扉，雨露般滋润我心田的，是叶绍钧（圣陶）先生写的《稻草人》，还有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我如饥似渴地寻找圣陶先生的著作，包括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在上海主编出版的刊物《中学生》，成了我认识世界、理解生活的金钥匙。但是，在战乱时代，在日寇统治下的苏州，很难找到几本《中学生》。

正因为这样，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就迫切期望《中学生》从重庆迁回上海出版。当它果真在上海复刊后，我就成为每期必读的忠实读者。《中学生》杂志发起“中学生之友”的读者自我介绍活动，我立即写了文章寄去，成了积极响应“中学生之友”活动的第一位读者。

没有想到，这篇短文寄出不久，就收到了圣陶先生的亲笔来信。是毛笔写的，端正而苍劲有力的楷书。原来，我的短文中写了一句：“他（指我自己）不想做英雄的石像，只想做石像下的台基。”圣陶先生针对这句话，很恳切地向我指出：他所写的《古



晚年的叶圣陶先生

代英雄的石像》，意思是英雄只是空虚的偶像，石块应当铺大家要走的路，不要误解了。

一个少年接到自己所敬仰的大作家的信，必然有极大的喜悦和兴奋，同时我又为圣陶先生对自己作品社会效果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信中充满了对一个少年读者的亲切、和蔼、认真、严肃的关怀和指引，我立即写了回信，解释说：我所讲的英雄是指真正的英雄业迹，我愿为这英雄业迹像做一些基础工作。

我的自我介绍的短文在1947年7月号《中学生》刊出的时候，编者加了这样一段话：